

第二方言和第三方言習得中的挑戰 ——孫中山 1924 年的粵語和國語錄音

陳潔雯

俄亥俄州立大學

chan.9@osu.edu

提 要 孫中山先生（號逸仙）1924 年的兩段簡短錄音，是研究他第二和第三漢語方言習得的語料庫。他的第一方言是中山粵語，第二方言是標準粵語，第三方言是國語。本文針對 1924 年孫中山用粵語朗讀和用國語朗讀的兩段簡短錄音進行分析，研究他在粵語和國語言語產出中所犯的錯誤類型，重點探討他在目標方言正確發音中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模式，且關注到他在原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的映射現象。

關鍵詞 中山粵語；粵語；國語；方言習得；孫中山

壹 介紹

為了切合第 34 屆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NACCL）的主題——漢語語言學中的數據、方法和應用——本研究使用了一對口語語料庫的數據：即兩份孫中山的錄音。孫中山（1866—1925）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他是現代中國之父，是 1911 年清政府被推翻後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總統，也是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這一名字是他在 1895 年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根據他的日語名字中山樵的姓氏部份所取（日本人使用複姓，“中山”為姓，“樵”為名）。而他的號“逸仙”則是他去香港求學時取的。他的演講和組織能力無人不曉，1903 年他在夏威夷第一次向廣大聽眾發表演講，1905 年在布魯塞爾向學生發表了關於三民主義的第一次公開演講。（Martin, 1944: 89, 98）。

孫中山的母語是中山粵語，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香山片石岐方言，這一方言所流通的縣城是如今中山市的商業中心。後來，他又學會了標準粵語和國語，而這些都是這兩段錄音的基礎。這兩段 1924 年錄製的錄音，為分析孫中山習得兩種漢語變體提供了寶貴的聲學數據。這兩種漢語變體屬於兩個不同的方言群，標準

粵語作為他習得的第二方言，指的是那個時期在廣東省廣州市¹所說的粵語；而國語作為他習得²的第三方言³，指的是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國語。

本文對於孫中山第二方言和第三方言的習得研究結構如下：第 1 節首先介紹第二語言和第二方言的習得，以及選擇分析第二方言（和第三方言）習得數據的原因。第 2 節主要介紹孫中山及其對漢語三種變體習得的背景。第 3 節介紹孫中山的兩個語料庫，包含一份粵語錄音和一份國語錄音。第 4 節分析粵語語音語料庫⁴，第 5 節分析國語語音語料庫，並在第 6 節中提出了一些結論性意見。

貳 第二語言和第二方言習得

在研究孫中山的標準粵語和國語演講錄音時，本研究將他的粵方言和官話方言都視為漢語的方言，因此研究涉及的不是一個第二方言習得案例和一個第二語言習得案例，而是兩個第二方言習得案例。將粵語和國語習得視為方言習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方言習得與語言習得之間存在一些重要差異，後者可能涉及來自完全不同語系的語言，如英語和漢語——前者屬於印歐語系，後者屬於漢藏語系。這其中存在一個關鍵問題，即方言習得和語言習得的起點問題。正如 Siegel (2010: 136) 所指出的：

“……就語言知識而言，第二方言習得和第二語言習得的出發點是非常不同的。二語學習者在開始二語習得時通常對二語沒有任何語言知識基礎。但當第二方言學習者開始第二方言習得時，他們知道第二方言的大部份詞彙、

- 1 Chao (1947: 6) 指出，廣州市的粵語“或多或少被認為是粵語的標準形式”，這源於他對該城市“極高威望”的觀察。Chao (1947: 18) 進一步觀察到一種更獨特的次方言，該次方言在他的教科書或其他教科書中都未見收錄，這種次方言在 1949 年之前廣州的西部地區（即粵語中所說的西關）發現，“那裏有很多世家大族，並且他們的發音有一定的威望。”
- 2 對本研究進行的探討基於我個人對文中所指的第一方言、第二方言和第三方言的瞭解。我自己的第一方言、第二方言和第三方言習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孫中山的習得，以中山粵語的石岐變種為本土語，我在 Chan (1980) 中對其進行了語言學研究。我一路上“學”了一些標準粵語作為第二方言，又在大學裏“學”了國語作為第三方言。
- 3 這裏的第三方言是本人定義的，是為了將他習得標準粵語（第二方言）和後來習得國語（第三方言）區分開來。區分第三方言和第二方言是認識到說話人對另外兩種語言變體的瞭解有助於習得第三種變體。
- 4 特別感謝 95 歲的家母，感謝她 1924 年中山（石岐）版發音的演講。同時還要感謝兩位來自廣州的資深粵語人士，感謝他們義務提供 1924 年粵語演講的廣州西關發音。同時還要感謝俄亥俄州立大學漢語研究館館員李國慶教授也提供了一些相關資料。

語音、詞法和句法，且第二方言與第一方言存在的差異較小，學習者只需要學習其存在差異的部份。”

在學習另一個漢語方言群的語音時，最大的障礙是原方言和目標方言的語音體系差異，例如在粵方言和閩方言中就存在着這樣的障礙。以區域為例，如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面積為 22,000 平方英里（56,000 平方公里），而俄亥俄州面積為 44,825 平方英里（116,096 平方公里），它大約只有俄亥俄州面積的一半。在珠江三角洲內，台山和中山之間的距離為 41.6 英里，即 66.9 公里，這大約與哥倫布和俄亥俄州的舊首府奇利科西之間的距離（43.4 英里，或 69.8 公里）相同。

然而，儘管台山粵語和中山粵語都屬於粵語方言群，但一個只講中山粵語的中山人第一次聽到台山粵語時，會很難理解對方的日常言語。⁵ 然而，如果這一個中山人懂得運用替換規則，找出這兩個變體之間的一些有規律的語音對應關係，同時學習一些常用的日常詞彙，那麼他將在沒有正式指導的情況下達到一定程度的理解。例如，陰平調在中山粵語中是高平調值 /55/，對應台山粵語中的中平調值 /33/；中山粵語中的第三人稱複數是渠哋⁶ [k^{hy}51 ti³³]，對應台山粵語的 [k^{hiak}21]（詹伯慧，張日昇：1987；詹伯慧，張日昇：1988）。這種替換涉及直接的一對一對應，除了在聲調、聲母和韻母的發音上有系統的差異外，這兩種方言在形態、詞彙和句法上都有很大的相同之處。雖然粵語和國語之間的差異顯然比粵語方言之間的差異大，但其實它們仍然存在有助於理解的系統對應關係，而其細微的不對應關係對於言語交際的影響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具體情況要根據實際交際需求來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趙元任自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以來就對漢語方言進行了廣泛的實地研究，並針對這一問題發表了一些評論，這些評論基本上挑戰了大方言之間（至少在受過教育的民眾中）無法相互理解的觀點：

“就像其他語言一樣，不同方言之間的相互可理解性，既取決於方言本身，也取決於說話者的教育背景……總的來說，漢語方言之間的差異沒有英語和德語之間的差異那麼大……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習得普通話的方式要麼是從說普通話或已經學會說普通話的人那裏‘學’來的，要麼只是學會運用

5 以我的兄弟舉例，當他與從未上過學且只會台山粵語的岳母交談時，他便聽不懂她所說的話，無法和她進行任何深入的交談或爭論。時間久了，住在一個屋簷下，他的理解力也確實漸漸提高了，然而他們之間的交談還是很有限。

6 “渠”是一個第三人稱假借詞，歷史上分佈於廣東省以外的中國東南部地區。詹伯慧、張日昇（1978）粵語圖表中使用的實際上包含部首“人”（亻+渠），現一般寫作“佢”。

《紅樓夢》等普通話小說的詞彙，而不嘗試對發音進行任何調整……在公共生活中，方言差異引起的語言困難可以忽略不計。”（Chao, 1947: 5）

他還自信地說道，“對於一種漢語方言的全面學習相當於對整個漢語系統的介紹”。⁷（Chao, 1947: 7）

對於第一次聽到一種完全不同語系的語言的人來說，上述情況並不適用。雖然可能有大量的外來詞從強勢語言進入目標語言，但卻無法從它們之間找到系統的語音、詞彙和句法對應。二語習得本質上涉及到習得一種全新的語言系統，這種語言系統也可能使用完全不同的文字來書寫，比如介於中文文字系統和英文的字母系統之間的文字。

對孫中山的粵語和國語演講的研究，涉及相同的主題和基本目標，並且僅限於詞彙和句法。因此，在將其視為來自兩個方言群的方言而不是兩種語言的情況下⁸，這兩段演講是研究孫中山習得標準粵語和習得國語之間差異的絕佳資料。

叁 孫中山和他的語言習得

首先簡要介紹孫中山（1866-1925）的生平。他於 1866 年 11 月 12 日出生於中山⁹翠亨村，更準確地說，是香山縣的翠亨村。1925 年，在他去世後，香山縣以他的名字更名為中山。縣城石岐所說的中山粵語也是周邊地區以及包括翠亨村在內的南郎鎮的主要方言。（趙元任，1948；Chan, 1980；林柏松，1997）兒童時期，孫中山就住在他們村子裏，在村裏的學校接受傳統的古典教育（Martin, 1944），教學語言應該是當地佔主導地位的石岐中山粵語。

中山縣的語言情況很複雜，居民說不同的粵語變體，以及客家方言和閩方言（林柏松，1997）。因此，石岐的中山粵語（簡稱為中山粵語）成為全縣急需的通用語言，也因此成為該縣的教育語言。此外，由於說中山粵語的人不僅居住在自己縣內，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定居於澳門和夏威夷，中山粵語也成為這兩個地方的通用語言和教育語言（趙元任，1948a；Lai, 2000；Egerod, 1956；Chan,

7 趙元任（1947:5）確實認識到，對於普通人（受教育程度較低、詞彙量以及與外部接觸有限的人）來說，這些人的口語交流是不可能跨越方言群體的。因而，教育是一個關鍵因素；因此，“對一種方言的全面教育”是有必要的。

8 將粵語和國語視為不同的漢語方言群實際上追尋的是趙元任（1947）和其他對漢語方言進行了廣泛研究的語言學家（Li, 1973；Norman, 1988；Yue, 2003；Yan, 2006；等）的腳步。

9 為便於參考，本文的“中山”同時指縣名和中山粵語。

1980)。

1879 年，13 歲的孫中山隨母親去到哥哥成功移民的地方——夏威夷檀香山。¹⁰ 由於能夠繼續在夏威夷使用中山粵語，孫中山與居住在夏威夷的中國居民交談起來並沒有語言障礙。他作為寄宿學生在夏威夷一所著名的英國國教學校（現在被稱為伊奧拉尼學校）接受教育，在那裏學習了英語、西方科學、基督教等等。孫中山 17 歲的時候，他哥哥擔心他想受洗成為基督徒，就把他送回了家。（後來他確實接受了洗禮。）回到中山後，他因破壞了當地寺廟的神像而上了麻煩，他的家人隨後把他送到香港（英國殖民時期）學習。而他在夏威夷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也為他前往香港學習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從 1883 年到 1895 年，從 17 歲到 30 歲，孫中山主要生活在香港，在選擇醫學領域之前，他在中學學習，他也曾在廣州學習過醫學。時年 26 歲的孫中山於 1892 年 7 月獲得了香港大學醫學學位，並以行醫為目的前往澳門。但後來孫中山將注意力轉向革命活動，他於 1894 年返回檀香山，在那裏創立了興中會，並於 1895 年在香港創立了分會。¹¹ 在那十年裏，孫中山也經常回家。因此，孫中山在香港和廣州接觸了標準粵語。同時，由於他還在澳門、夏威夷和中山住過了一段時間，而那裏當地的權威方言是中山粵語，他得以有足夠的機會繼續使用他的中山粵語。因此，到 30 歲時，孫中山的前半生，是在標準粵語佔主導地位的地區或中山粵語為當地權威方言的地區中度過的。

孫中山的前半生不需要經常使用國語交談，但他的秘密活動可能促使他接觸到一些說國語的革命者。¹² 而孫中山的後半生卻非常需要使用國語。他對國語學習的需求可以從他在 1895 年至 1911 年流亡期間，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以及他在革命結束後返回中國來推斷。根據 1924 年的錄音，當時他講國語時帶有濃重的廣東口音。孫中山的後半生曾旅居日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並多次在國內外發表演講，足跡遍及夏威夷、歐洲、北美、東南亞。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南京是新中華民國的首都，但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官話

10 關於孫中山的資訊來自多個來源，其中包括 Hahn (1941)、Martin (1944)、Epstein (1993)、Sharman (1965)、Chang (1986)、Bergère (1994) 等等。然而，這些資料都沒有提供孫中山和孫夫人（宋慶齡）之間交流所用語言的線索。孫夫人出生在上海，在美國接受教育。當她擔任孫中山的秘書起草和翻譯英文材料時，用的很可能是英語，但無法確認這是否也是他們 1915 年結婚後十年裏在家使用的主要語言。

11 1919 年，孫中山以國民黨的名義重新建立了這個組織，並因此成為其第一任領導人。

12 孫中山最親密的合作者中，即使不是大多數，也有很多人似乎都有粵語背景。同時，他的政治根據地不在中國北部，而在廣州、香港、檀香山和日本。

不是南京官話，而是以北京官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雖然在明朝和清朝的大部份時間裏南京方言都是享有盛譽的方言，但從語言和地理上分析，以北京方言為代表的北方官話和以南京方言為代表的南方官話哪個佔主導地位仍存在着重大分歧（Lobscheid, 1866）。但到 19 世紀後半葉，特別是在太平天國（1850-1864）之後，隨着南京的淪陷和人口的大量減少，北京官話超過了南京官話的地位（Chen, 1999:11；Coblin, 2002:540）。因此，當時演講的孫中山希望自己的國語能更接近北方官話。

肆 孫中山的兩個語料庫：標準粵語和國語錄音

1924 年 5 月 30 日，《中國晚報》在廣州錄製了孫中山的錄音，大約 9 個月後，他於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這兩段錄音演講重新闡釋和強調了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思想，即民族、民權、民生和救國方針。儘管孫中山多年來在國內外發表了多次演講，但據我所知，這兩段錄音是孫中山演講的唯一已知錄音。

雖然當時孫中山身體不好，正處於康復之中，但他還是非常熱情地接受了錄製這些錄音的邀請。這些演講本身不是演講，而是朗讀，它們的目的是直接向聽眾發表講話，使用的語言可能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大眾來說更好理解。¹³ 在孫中山逝世四週年之際（1929 年 3 月 12 日），這兩段錄音被《中國晚報》以《中山先生留聲紀念集》的方式出版。作為本研究的演講語料庫，這兩段錄音可以在很多網站上找到。¹⁴

兩段錄音中的標準粵語錄音為他的標準粵語發音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小特徵，其中包含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的混合，而國語錄音，由於他很晚才學會國語，所以口音很重，受標準粵語的影響很大。表一總結了這兩段錄音的相關信息。

標準粵語演講的時長為 7 分鐘，而國語演講的時長為 14 分鐘。AntConc（Antony, 2022）從語料庫的轉錄文本中獲取單字類型和單字總數。單字類型數量是指每個語料庫中不同的單音節語素（即單個漢字圖形或字元）的數量。單字總數是指這些語素出現的總數。

13 Tsui & Chan (2020) 對孫中山在 1924 年的粵語演講中使用的詞彙進行了一項小規模研究，發現只有少數幾處選用了更具文學性的詞彙。

14 這兩段錄音的原始網站已經消失，但資料可以從許多其他網站上找到。這些文字記錄有兩個來源，其中普通話版本已無法獲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dfGIBfc38>，https://archive.org/details/dr_sun_yat_sen_1924。

表一 標準粵語和國語語音語料庫中的單字類型和單字總數

	標準粵語語音語料庫 (7 分鐘)	國語語音語料庫 (14 分鐘)
單字類型	236	317
單字總數	861	1,625
	平均每種單字出現 3.6 次	平均每種單字出現 5.1 次

表一顯示，7 分鐘的粵語演講單字總數為 861 個，而 14 分鐘的國語演講單字總數為 1,625 個。粵語語料庫中的 861 個單字包含了 236 個單字類型，因此平均每種單字類型出現 3.6 次。國語語料庫中的 1,625 個單字包含了 317 個單字類型，每種單字類型平均出現 5.1 次。可以看出，錄音長度加倍並沒有使國語語料庫中不同語素的數量加倍，國語語料庫比粵語語料庫包含更多的重複語素。

由於這兩次政治演講的主題和目的不同，因此呈現出的語素分佈也非常不均勻。儘管表一中給出了每種單字類型出現的平均次數，但許多語素實際上在兩次演講中僅出現一到兩次，而少數語素則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出現。例如，在 7 分鐘的粵語錄音中出現 20 次或以上的語素包括“國”（48 次）、“中”（29 次）、“主”（20 次）、“民”（20 次）和“義”（20 次）。在 14 分鐘的國語錄音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出現 20 次或以上的語素包括：國（65 次）、民（37 次）、中（34 次）、命（31 次）、革（28 次）、義（26 次）、主（25 次）和家（22 次）。國語語料庫中的 39 個語素中有 32 個也出現在粵語語料庫中，這進一步證明了兩個語料庫的相似性。

這兩個語料庫的最大差別在於粵語語料庫中存在白話字。如下所示，一些標準的（以國語為基礎）漢語語素對應於粵語語素或使用拼音進行拼寫，其中括弧內的為粵語語素的對應形式：來（嚟）、睡（瞓）、的（嘅）、們（咁）、了（喇）、不（唔）、甚麼（乜）、這（呢）、了（曉）、是（係）以及哪（邊處）。孫中山使用“曉 [hiu]”，而不是現代的標準粵語“咗 [tso]”，反映了標準粵語的早期階段（Ball：1888，1907）。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的粵語演講也使用了“曉 [hiu]”作為動詞來表達“理解”這一含義，它對應現代粵語和現代國語的“知道 [tsi tou]”。（Ball，1908）

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本文將更詳細地研究這兩個語料庫所展現出關於孫中山方言習得的情況。需要注意的是，由於語料庫規模較小，語素範圍有限，根據錄

音對孫中山演講的研究只能捕捉到他實際演講的一小部份，且集中於他的政治觀點上。所以，如果他能自如地在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之間進行語碼轉換，那也僅能表明他在特定內容輸出上能轉換自如，而不能代表全部內容都能如此。

伍 粵語口語語料庫

粵語演講的目標受眾為廣大海內外的粵語聽眾，其中包括夏威夷¹⁵以及東南亞、歐洲、美國、加拿大等海外粵語社區。孫中山選擇的粵方言是標準粵語，即地方通用語。這點可以從他立即糾正標準粵語的“進 [tsən]”中得到證明，他將他的的中山發音 [tsən] 改為他想要的標準粵語發音 [tsən]。在“千邦進貢” [ts^{hi}:n pəŋ tsən tsən kuŋ] 中，記錄了這兩種形式依次出現：孫中山先是說了 [tsən]，然後馬上自我糾正為 [tsən]。這是他在演講中唯一一次對發音進行自我糾正。

通過研究孫中山習得標準粵語的過程，可以將其粵語錄音分為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將在表二中一一羅列。

模式 1 中，孫中山成功地發出了正確的標準粵語發音。這是因為這兩種方言之間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原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存在清晰的、系統的、一對一對應模式。模式 1 還有第二種可能情況，其中一種涉及原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的二對一對應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中山粵語的發音對應為一個標準粵語的發音。第三種情況涉及部份的一對二對應模式，即中山粵語相同讀音對應標準粵語中兩個不同讀音。

模式 2 中，孫中山以中山粵語的一些發音來發出標準粵語的語音。這可能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例如中山粵語中語音合併了但在標準粵語中保留不同讀音。這邊特別指中山粵語中的聲調合併現象，這情況涉及原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聲調的一對二對應模式。第二種情況來自中山粵語的干擾，其中原方言語音和目標語音非常接近。對於孫中山來說，這種語音差異可能還不夠明顯，以至於他無法察覺到差異並正確發音。所以孫中山用他的母語發音代替了標準粵語中的目標發音，這是一種常見的 second dialect 習得現象，也存在於 second language 習得中。

模式 3 中，孫中山在嘗試用國語表達的過程中前後未能保持一致，這是由於兩種粵語的合併模式不同，而孫中山還不能完全分辨他們的發音差異，這就導致了他的語音輸出出現了變動。

15 那時，夏威夷已經被吞併成為美國領土，直到 1959 年它才成為美國的第 50 個州。

表二 孫中山粵語演講的三種基本模式

模式	描述
模式 1	標準粵語音段和音調的採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該模式下，孫中山能輕易識別出標準粵語中的不同發音，並正確表達。 一對一或二對一對應模式，後者涉及標準粵語中的合併。 由於中山粵語中的合併，對應模式可能是涉及片段的一對二。
模式 2	保留部份中山粵語音段和聲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該模式下，孫中山都是中山粵語的發音，由於中山粵語合併等各種因素而被保留下來。 由於中山粵語中的合併，對應模式是涉及聲調的一對二對應模式。 其他因素可能涉及到來自中山粵語的干擾。
模式 3	在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兩種類型之間的變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由於合併的模式不同，這些是孫中山最難準確發出的聲音。 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之間的對應模式不規則。

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的粵語例子都使用國際音標符號轉錄，以便更清晰地進行比較。

一、模式 1：標準粵語音段和聲調的採用

這裏為模式 1 提供了兩個示例：例 1 為原方言和目標方言的二對一對應模式，例 2 為原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直接的一對一對應模式。

例 1：孫中山在“感”[kɛm] 中的發音為 [ɛm] 而不是 [ɔm]。

乜 嘢 個 感覺

met jɛ kɔ kɛm-kɔk

甚麼 東西 量詞 感覺

“甚麼樣的感覺”

例 1 中所提到的發音，Ball 在《粵語易通》（*Cantonese made easy*, 1924）中，甚至在 1888 年和 1906 年的早期版本中，標準粵語的韻母 [ɛm] 與 [ɔm] 是對立的。另一方面，Jones & Woo 兩位學者（1912）只記錄了韻母 [ɛm]，這表明到 1900 年左右，對一些粵語使用者來說¹⁶，標準粵語中的 [ɔm] 和 [ɛm] 已經合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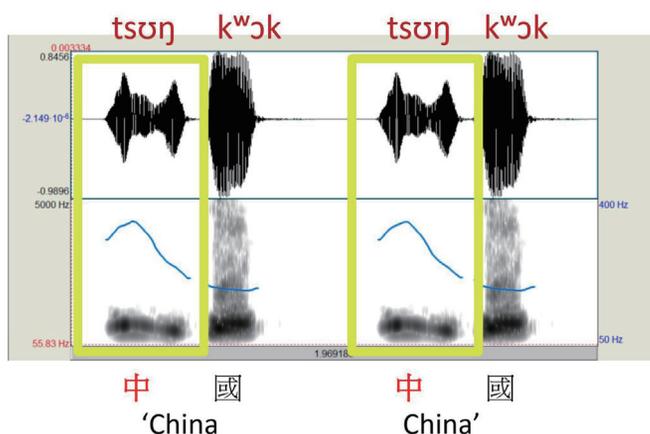
16 Jones & Woo 只使用了一位發音人，即第二作者，他的標準發音在 Jones 的序言中得到了讚揚（1912）：“Woo 先生說一口流利的典型粵語，他的發音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極好的標準。”這裏使用 1912 年作為該書的出版年份。

相比之下，中山粵語至少在整個 20 世紀都保留了 [ɐm] 和 [ɔm] 之間的對立 (Chao, 1948a; Chan, 1980; 林柏松, 1997)。因此，在中山粵語中，感 [kɔm] “感覺” 和錦 [kɐm] “錦緞” 形成了一個最小對立。而到 1924 年孫中山演講時，這兩個韻母在標準粵語中已經合併為 [kɐm]，這可以從 Jones & Woo (1912) 推斷，合併早在十年前就已經發生了。

例 1 除了可以說明模式 1 之外，還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發現，即從屬助詞的發音可能不確定。無論是“個 [kɔ]”還是“嘅 [kɛ]”，孫中山都用元音 [ɔ] 發音（但重音通常很弱，可以轉錄為 [kə]）。Ball (1888, 1907, 1924) 列出了“個”和“嘅”這兩個詞，而 Jones & Woo (1912) 只用了 [kɛ]。這表明在 20 世紀的前十年，標準粵語中的從屬助詞就已經只有“嘅 [kɛ]”了，而中山粵語則仍然保留“個 [kɔ]”。有趣的是，Ball (1902) 在另一本書《如何說粵語》(How to speak Cantonese) 中證實了 Jones & Woo (1912) 在那本教科書中只提供了“嘅 [kɛ]”。

圖一中的例 2 使用來自 Praat 多功能語音學專業軟件 (Boersma & Weenink, 2022)¹⁷ 的螢幕截圖，舉例展示了原方言和目標方言的一對一對應模式。孫中山一貫地將“中國”的“中”發音為標準粵語高降的陰平調 /53/¹⁸，而他的中山粵語對應的聲調則是高調 /55/¹⁹。標準粵語陰平聲中的高降調 /53/ 對於孫中山來說可能特別突出，因為它在語音上與中山粵語陽平聲的高降調 /51/ 相似。

圖一 持續發音的高降調陰平



17 帶有螢幕截圖的數據直接來自會議上演示的 PPT 簡報。

18 調值使用趙元任 (1980/1930) 的調值標記法，“1”到“5”表示從最低到最高的音高範圍。中山粵語的調值來自趙元任 (1948a) 和 Chan (1980)，標準粵語的調值來自 Chao (1947)。

19 現今香港粵語的陰平調值與中山粵語類似，是一個高調值。

例 2 還表明，孫中山在“國”中發出了圓唇化軟顎塞音 [kʷ]，從而與例 1 中的“覺” [kɔk] 形成了一個最小對立：“國 [kʷɔk]”和“覺 [kɔk]”。然而，中山粵語在非高後元音 [ɔ] 之前這兩個聲母合併成非圓唇化的軟顎塞化：[kɔk]。²⁰ 因此，儘管在中山粵語中已經合併，孫中山還是正確區分出標準粵語的 [kɔk] 和 [kʷɔk]。

鑒於語料庫中的語素有限，因此很難確定他到底是如何做出區分的，因為這需要將一系列標準粵語詞彙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是有普通軟顎塞音的，另一組是有圓唇化軟顎塞音的，由於標準粵語中具有圓唇化軟顎塞音的語素在國語中也同樣存在，這就需要弄清到底哪些語素在 [ɔ] 之前有圓唇化軟顎塞音，哪些語素有普通軟顎塞音。而孫中山聽出了這種差異並且在他 1924 年的粵語演講中區分了這種差異。在其他元音之前存在圓唇化和普通軟顎塞音是有助於區分的，例如兩種粵語方言都區分“跟” [kɛn] “跟隨”和“軍” [kʷɛn] “軍隊”。孫中山在標準粵語中的區分能力也使他能夠在國語中聽出區別和做出區分，例如兩種粵語方言都區分“港” “港口”和“廣” “寬廣，廣闊”，對應標準粵語中的“港” [kɔŋ] “港口”和廣 [kʷɔŋ]。而在中山粵語中，“港”和“廣”的發音都是 [kɔŋ]。

模式 1 提供的兩個例子表明，孫中山非常清楚自己的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之間的差異，他也能夠在這兩種方言的語音做出區分。在例 1 中，他知道標準粵語沒有 [ɔm] 韻母，因此中山粵語的 [ɔm] 和 [ɛm] 在標準粵語中只對應一個形式，即 [ɛm]。這種對應非常簡單，涉及的是二對一的對應模式。例 2 是一個更簡單的一對一對應模式的例子，只需將中山粵語的高調替換為標準粵語的高降調。

二、模式 2：保留部份中山粵語音段和聲調

模式 2 保留了一些中山粵語聲調和音段，其中有兩種情況：（1）標準粵語的聲調是對立的而在中山粵語中是合併的，（2）保留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中有點相似的中山粵語發音，這樣的孫中山很難察覺到區別來調整他的發音以準確地發出目標方言的語音。

下面提到的前兩個例子屬於第一種情況，涉及聲調一對二對應模式的困難。為了幫助理解中山粵語的聲調合併，表三提供了研究例 1 和例 2 相關的兩個歷史聲調類別的背景。

如表三所示，中山粵語只有一個上聲調和一個去聲調，而標準粵語中這兩個歷史聲調陰陽分離，表現為陰上對陽上，陰去對陽去。

20 香港粵語也將圓唇化軟顎塞音聲母合併到普通的塞音聲母，也許方言的接觸促成了今天香港粵語的這些合併，香港粵語變得越來越像中山粵語了。

入聲方面，標準粵語有三重對比，陰入分為上陰入和中陰入。相比之下，中山粵語只有兩個入聲：陰入和陽入。從表三可以看出，中山粵語的陽入包含了標準粵語中的中陰入和陽入。標準粵語有九個聲調，而中山粵語（Chao, 1948a；Chan, 1980）只有六個聲調：陰平：/55/，陽平：/51/，上聲：/13/，去聲：/22/，陰入：/5/，陽入：/2/。

表三 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中的上聲、去聲和入聲

中山粵語	標準粵語
上聲 (13)	陰上 (35)
	陽上 (23)
去聲 (22)	陰去 (33)
	陽去 (22)
陽入 (2)	中陰入 (3)
	陽入 (2)

上文實際上已經提到到過聲調一對二對應模式的例子。其中涉及中山粵語陽入調 /2/，對應標準粵語中的兩個獨立聲調 /3/ 和 /2/。一種情況是在模式 1 例 1 中：“覺”，中山粵語為 [kɔk.2]，標準粵語為 [kɔk.3]，孫中山用他的中山粵語發音 [kɔk.2] 來發音。另一種情況是在圖一例 2 中，其中“中國”一詞中的“國”，孫中山所發的音是陽入，如 [kʷɔk.2]，而標準粵語是 [kʷɔk.3]。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使用了中山粵語陽入 /2/ 代替標準粵語的陽入 /3/。孫中山將“中國”發音為 [tsuŋ.53 kʷɔk.2]，而不是聲調為 /3/ 的 [tsuŋ.53 kʷɔk.3]。

可以看出，由於存在原方言到目標方言的一對二對應模式，而造成孫中山的發音錯誤。他難以聽出和發出標準粵語中存在這種語音對立現象的發音，因為這些對立在他的源方言中已經合併了。²¹ 孫中山使用了中山粵語的上聲和去聲的音高值，如示例 1 和 2 以及 Praat 截圖所示。²²

圖二中例 1 為“所以”，其中“所”為陰上，“以”為陽上。發音人 A 是孫中山，發音人 B 是一位 1940 年出生於廣州市西關區的女性，錄製時間是 2016 年，發音人當時 75 歲。兩位發音人的錄音非常清晰地表明，孫中山保留了上聲調 /13/，對應標準粵語中的陰上和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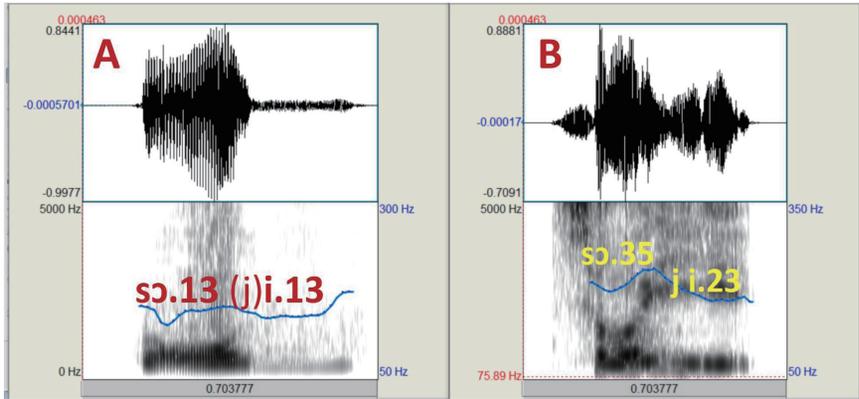
圖三中的例 2 是句子“中國就政治退化”。A 和 B 與圖二中的發音人相同。

21 現代香港粵語中的聲調合併一直在進行，包括上聲和去聲音域分離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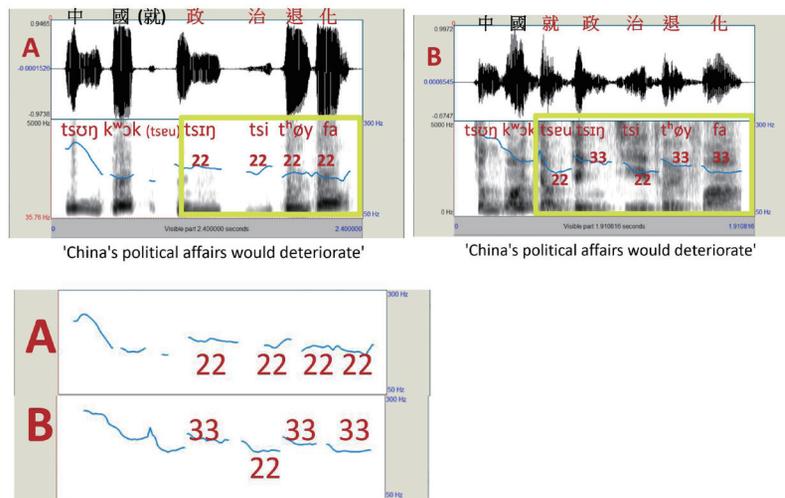
22 作為一個中山粵語母語者來學習標準粵語，我和孫中山一樣，很難發出標準粵語的全套聲調。

重點是句子結尾的兩個雙音節詞，其中複合詞“政治”是陽去和陰去的序列 /33 22/，而“退化”是兩個陰去音節的序列 /33 33/。孫中山使用他的中山粵語去聲調 /22/ 發出的四個音節：/22 22 22 22/，而不是母語者發出的 /33 22 33 33/。

圖二 模式 2 例 1. 發音人 A (孫中山) 和發音人 B (廣州人) 所說的“所以”



圖三 模式 2 例 2. 發音人 A (孫中山) 和發音人 B (廣州人) “中國就政治退化”的發音



模式 2 中的例 3 的發音人 A 是孫中山，發音人 B 是一位 60 多歲的廣州本地人，可以看出孫中山的中山粵語發音受到了“世界上”中的“上”這個語素的干擾。並且可以觀察到兩點，孫中山在“上”中發出了一個具有雙元音性質的元音 [øɔ]，與廣州本地人發的 [œ:] 元音形成對比。與圖三中的聲調合併類似，孫中山用中山粵語的去聲調發了三個音節，而不是標準粵語的聲調序列陰上一陽上一陽上：/33 22 22/，這也可以作為聲調一對二對應模式的模式 1 的另一個例子。

模式 2 例 3：在 [øɔŋ] 韻尾中，孫中山 (A) 發的是中山音 [øɔ] 和中山粵語去聲，

而不是標準粵語（B）的形式。

世 界 上

A: səi.22 - ka:i.22 səŋ.22

B: səi.33 - ka:i.33 sə:ŋ.22

世 界 上

“世界上”

音段和聲調在標準粵語習得上的差異是有趣的，值得進一步研究。前面提出的音段的一對二對應模式屬於模式 1，而這裏給出的聲調的一對二對應模式屬於模式 2。可以看出，即使是對習慣說聲調語言的人來說，區分及認知調值也比區分音段更為困難。且這種情況可以更複雜，如下面第三節的模式 3 所示。

三、模式 3：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形式之間的變動

模式 3 涉及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之間的變動，在該模式下，孫中山的發音很難一直保持正確無誤。最大的困難在於兩種方言的混合，這通常涉及一對二的對應模式困難。模式 3 例 1 中提供了一個例子，孫中山似乎很熱衷於將所有標準粵語的 /i/ 和 /ei/ 轉換為單元音 /i/。且奇怪的是，孫中山發“自己”中的“己”時是特殊調值 [51] 而不是 /13/，在其他地方出現“自己”這詞時這個特殊調值會重複出現。在演講中的其他地方，孫中山的發音在 [i] 和 [ei] 之間波動，有些單字似乎介於兩種形式之間。

模式 3 還包括一些產生混合結果的多向對應模式，表四給出了一個例子。其中中山粵語有 5 個不同的中古晚期漢語聲母²³，而標準粵語中已減少到只有兩個。然而，孫中山的發音與他的目標方言的發音並不完全匹配，不匹配的情況如表所示。符號 /Ø/ 是“零聲母”，表示音節開頭沒有輔音聲母。²⁴

模式 3 例 1：孫中山（A）發出的 /i/ 對應標準粵語發音人（B）的 /i/ 和 /ei/

各 國 自 己 打 自 己

A: kək.2 kʷək.2 tsi.22 - ki.51 ta.13 tsi.22 - ki.51

B: kək.3 kʷək.3 tsi.33 - kei.35/55 ta.35 tsi.33 - kei.35/55

表四中的語素來自孫中山的演講，可以說明源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複雜的多向對應模式。孫中山的聲母讀音放在第三欄。可以看出，孫中山的講話是由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聲母混合組成的，聲母的發音是不一致的，沒有明確的一對一或

23 中古晚期漢語的重構來自 Pulleyblank (1984, 1991)。

24 有關“零聲母”的討論，請參閱 Chan (2023)。

二對一對應模式。雖然中山粵語中的 /h/ 是“匣”的聲母（晚期中古漢語 *xɦ）在“現”和“形”中的現代對應模式，但孫中山在“現”中保留了中山粵語的 /h/ 聲母，而在“形”中卻沒有。中古疑母字，中山粵語在高元音前仍保留軟顎鼻聲母的發音，而標準粵語即採用滑音 /j/ 的讀音，而孫中山在目標方言（即標準粵語）採用了目標方言的發音，其中高元音前的 *ŋ 脫落。與標準粵語的發音相比，他在前高元音之前發的滑音 /j/ 往往相當弱。這可能是因為中山粵語在高元音之前是零聲母而不是同音滑音（Chan, 2023），同時孫中山的發音也並不完全是目標形式。

表四 中山粵語聲母、標準粵語聲母和孫中山的聲母發音對比

標準粵語	中山粵語	孫中山的發音
/h/：恐 後	/k ^h /（*k ^ʰ ）：恐	/h/：恐 後
	/h/（*xɦ）：後 現 形	
/j/：現 形 已，演 弱 業，義	/Ø/（*j）：已，演	/j/：形 已，演 弱 業，義
	/j/（*r）：弱	
	/ŋ/（*ŋ）：業，義	

使用對應模式策略對三種模式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標準粵語習得的難度涉及一對二對應模式和多重對應模式。研究他們如何發出與母語者相近的發音是一個相關又獨立的問題。在一對一和二對一對應模式的情況下，標準粵語說話者可以利用系統對應模式來找出對應關係。總體而言，可以預期那些保留更好的歷史語音類別的方言使用者在分析源方言和目標方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方面更加容易且具有更大的優勢。因此，其可能促進使用者更好地理解目標方言，從而更快地習得標準粵語。雖然模式 3 還存在更多其他的例子，但對粵語口語語料的介紹就先到這裏，下面將對國語口語語料進行介紹和分析。

陸 國語口語語料庫

孫中山的國語演講目標受眾是眾多的國內聽眾，當然也可能涉及海外講國語的國際聽眾。如前文第二節所述，儘管北京不是他的政治根據地，但孫中山所說的國語仍是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而不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南方官話。據

衛三畏 (Williams, S. Wells) 所言，到 19 世紀末，北京的國語在當時的中國已經是“最官方且流行的語言” (1889 : xxxii)，北方官話取代了保留了入聲的南方官話。高本漢 (Karlgren, 1918 : 1) 於 1910 年至 1911 年居住在中國，並在清朝滅亡不久後返回歐洲，他觀察到：“在眾多的官話中，北京話是當時最流行的，是在宮廷和京城使用的語言。一般來說，那些講國語、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明顯更傾向於採用北京發音。”事實上，1911 年政府就指定國語標準音主要以北京話為基礎 (Chen, 1999 : 15ff.)，這導致了 1919 年注音字母 (後來更名為注音符號) 的出現，並且 1932 年還進行了進一步修訂，以使國語更接近北京話 (Chao, 1947 : 8 ; 趙元任 1948b : 9)。²⁵ 儘管如此，正如 Simmons 提到的那樣 (2017 : 63)：“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中華民國教育部最終正式將北京話定為國家標準後，人們才開始慢慢接受以北京語音作為規範發音……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20 世紀 50 年代明確宣佈北京話為基礎方言後，北京話才正式確立為標準。” Simmons (2017 : 66) 進一步引用 Kaske (2008 : 41) 來解釋北京話確立為國家標準的緩慢步伐：“……由於人們對語言的不同態度，在一開始，北京話並未能獲得威望，因為南方方言相比於北京方言而言保留了更多的音位特徵，因此可以通過聲稱更接近古典標準來挑戰北京方言的權威。”

也由此在清朝滅亡後的最初幾年裏，孫中山並沒有強烈的需求去嘗試說純正的北京話。事實上，他所說的國語是一種較為寬泛的國語，很可能是在革命活動中與講國語的同胞交談而學到的。例如，他的國語沒有發出單獨的捲舌音，這在南方官話、粵語和其他南方方言中也沒有。

孫中山的國語發音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以北方官話為基礎，另一種則可以聽出受到粵語和南方官話的一些影響。下面將對觀察結果作簡要介紹，而更深入的結果有待後續研究。

一、模式 1：以北方官話為基礎

孫中山的國語發音似乎主要以北方官話為目標發音 (儘管也受到他粵語發音的強烈影響，而這也見於南方官話發音之中)。以下是一些反映北方官話的例子，以及一些例外情況。

1. 第一人稱始終使用圓唇滑音 [w] 發音，而不是使用來源於“疑”字聲母 (晚期中古漢語 *ŋ) 的軟顎鼻音。在他的國語中，軟顎鼻音並不充當聲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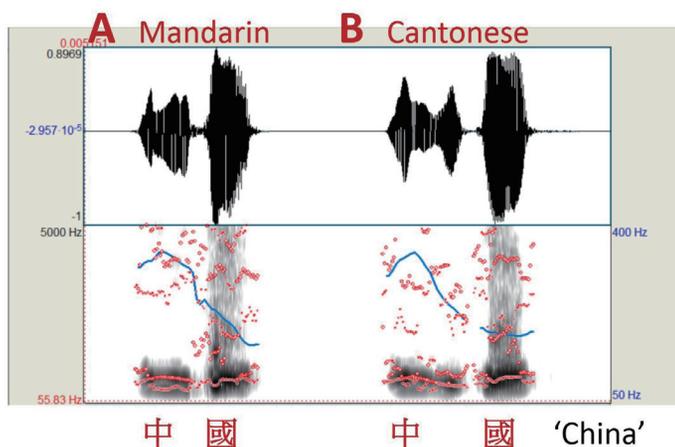
2. 能夠區分來自“來”字聲母 (晚期中古漢語 *l) 中的 /l/ 和來自“泥”字聲

25 有關該時期提出最新的關於政治和語言問題的更詳細的研究，請參閱 Tam (2020)。

母中的（晚期中古漢語 *n）/n/。（中山粵語現在仍然保留着這種區別。）

3. 音節中帶有入聲的語素脫落了入聲尾。也就是說，它們不是塞音尾音節，這反映了北京和其他北方官話方言的發展（入派三聲），歷史上入聲失去了 *-p、*-t、*-k 尾，並與其他三種歷史聲調平、上、去合併，這在孫中山的演講中是大體一致的。例如，他始終發出沒有尾音的從屬助詞“的”，將其發音為 [ti] 或 [tə]。但也存在例外，就“中國”中的“國”而言，正如來自 Praat 的圖四所示，孫中山在發音上相當一致，就好像他正在發出類似於標準粵語 [kʷɔk] 的塞音尾音節。

圖四 國語 (A) 和粵語 (B) 語料庫中孫中山“中國”一詞的發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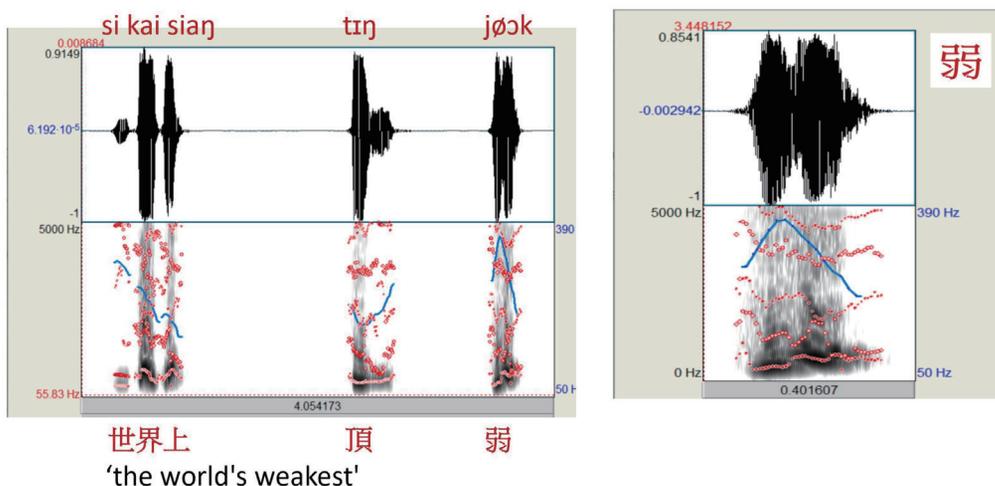


4. 中古晚期漢語軟齶塞音在高前元音之前發生齶化。在孫中山的演講中，25 個以中古晚期漢語軟齶塞音開頭的語素中，有 23 個都被發音為 [tɕ] 或 [tɕʰ]：君、家、假、幾、己、計、強、今、近、局、權、究、久、救、講、經、其、建等等。然而，有兩個例外：“界”和“解”，孫中山在所有情況下都發音為 [ka:i]。這兩個語素來自複合詞：“世界”中的“界”和“瞭解”中的“解”。雖然所有這些語素在粵語中都是以軟齶聲母開頭的，但這兩個例外仍然很有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南京方言中，“界”在 Hemeling (1907) 中也已被列為 <chiai>，而 Mateer (1922) 和趙元任 (1929) 則進一步證實齶化確實在 20 世紀 20 年代發生了。Mateer (1906) 的南京普通話教科書在 /i/ 之前仍然顯示軟齶聲母，這表明齶化可能發生在 19 世紀 90 年代至 20 世紀初期的某個時間，並且在衛三畏 (Williams, 1889) 所撰寫的《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找到“界”<kiai> 字的發音。

5. 捲舌音 [ɻ] 或類似捲舌音的聲母是晚期中古漢語“日”字聲母（晚期中古漢

語 *r) 的現代對應模式。然而，孫中山的發音並不一致，因為 [j] 出現在某些情況下，例如“人”和“責任”中的“任”等一些語素，且在其他地方 [j] 也出現了這樣的例子，如“弱”和“不然”的“然”。事實上，在他的普通話演講中，當孫中山忘記如何讀普通話中的“若”字時，他通常猶豫一下，然後繼續使用中山粵語中的 [jøɔk] 發音，但發的是一個降調。如圖五的 Praat 截圖所示，左邊是短語“世界上頂弱” [si kai siɑŋ tɪŋ jøɔk]，右邊是“弱”的特寫。

圖五 孫中山“世界上頂弱”的發音及右圖放大的音節“弱”



二、模式 2：受粵語和南方官話影響

孫中山的講話還體現了粵語和南方官話的特徵，例如南京話中的特徵。除了上面討論的北方官話的例外情況之外，下面介紹一些我們的發現。

1. 國語語料庫不包含獨立的捲舌齒音。

2. 語素“可”始終發音為 [k^hɔ]，而不是 [k^hʎ]。音節 [k^hɔ] 反映了與中山粵語相同的音節（與之相對，標準粵語的發音為 [hɔ]）。與中山粵語類似，南京話中的“可”讀作 [k^hɔ]（趙元任，1929；李榮，1995）。

3. 數字“六”孫中山讀作 [lu.51]，這令人費解。如果這來自南京話，那它應該要保留入聲尾。趙元任（1929：1032）提供了一個“六”的白讀音 [luʔ]，這也是李榮（1995：324）給出的發音。然而，這一困惑在參考 Mateer（1906：2）後得到了解答，他除了將“六”的常規讀音定為“liu4”外，還明確指出“六”“經常被文人讀作‘lu4’”。（他沒有給該形式提供任何解釋。）以孫中山為例，他肯定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文人，且在他的革命歲月裏，他一定培養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目前對孫中山普通話語料庫的研究還比較初步，主要是為了瞭解他的普通話習得。這段國語錄音是在中國的時候錄製的，當時還沒有一個明確並公認的國家口語標準，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也就無從獲得關於口語的教科書、詞典或其他教育資源。孫中山的普通話發音可能與那些受過教育的粵語母語者或者是其他非國語母語者在中國旅行時，與說普通話的人交流所說的國語沒有多大不同。

柒 總結

本文分析了孫中山於 1924 年錄製的兩個口語語料庫，這些錄音在孫中山逝世四週年（1929 年 3 月 12 日）時開放商用。這些錄音非常珍貴，因為它們是在中國錄音發展的最初幾十年中錄製的，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1 年（Crowe, 2019），其中中國歌劇唱片，尤其是京劇和粵劇在 20 世紀的前二十年主導了中國唱片業（Liao, 2017）。

這些錄音提供了兩組口語語料庫，用於研究個體的第二和第三方言習得，其中第二方言習得涉及一個方言群組內的兩種粵語方言，而第三方言習得則發生在兩個方言群組（粵語和國語）中。第二方言習得研究中出現的模式是針對從源方言到目標方言的不同對應模式進行分析的，由於這兩種方言的語音系統更為清晰，這些模式在第二方言習得的情況下也更加清晰。第三方言習得案例的情況則相對模糊，因為對於孫中山國語習得的確切目標尚不清楚，同時，目標方言受到兩種粵語方言的影響也增加了其複雜性（中山粵語和標準粵語的影響）。因此，將國語的習得標記為第三方言習得的情況意味着方言習得涉及來自第一方言（中山粵語）和第二方言（標準粵語）的輸入。

習得模式的策略包括源語言和目標語言之間的一對一、一對二、二對一或多方向的對應模式，這種對應模式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對應關係，否則學習者可能會簡單地將其視為替代：用目標語言的聲音替代源方言的聲音。這樣的情況只適用於一對一的對應模式，而無法考慮從源方言到目標方言的其他對應模式，而一對一對應模式屬於最簡單的情況。然而，正如本文所研究的那樣，目標方言與源方言的融合會增加學習者準確說出目標方言的難度。

這裏採用的對應模式策略本質上可以被視為一種前語言、前規則管理的方言習得方法。這正是人們可以看到語言習得（例如英語和漢語之間）和漢語不同方言之間（無論是在一個方言群內還是跨兩個方言群）發生的方言習得之間的差異。

參考文獻

- 趙元任 1929 〈南京音系〉，《科學》 13.8: 1005-1036.
- 趙元任 1948a 〈中山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0:49-73.
- 李榮主編 1995 《南京方言詞典》. 南京：江蘇教育部出版社
- 林柏松 1997 〈石岐方音〉，《漢語方言論文集》，鄧景濱主編，142-165. 九龍：現代教育研究社
-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一》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Antony, Laurence. 2022. AntConc (Version 4.0.5) [Computer Software]. Tokyo, Japan: Waseda University. Available from <<https://www.laurenceanthony.net/software>>.
- Ball, J. Dyer. 1888.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 Kong: 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
- Ball, J. Dyer. 1896. The Hōng Shan or Macao dialect. The Chinese Review 22.2:501-531.
- Ball, J. Dyer. 1902. How to speak Cantonese. Fifty conversation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 free and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romanised spelling with tonic and diacritical marks, &c.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Hong Kong: Kelly & Walsh.
- Ball, J. Dyer. 1907.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Ltd., Printers.
- Ball, J. Dyer. 1924.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Four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Ltd., Printers.
- Ball, J. Dyer. 1908. Cantonese made easy vocabulary.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Ltd., Printers.
- Bergère, Marie-Claire. 1994. Sun Yat-sen.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Chine au XXe siècle: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1895-1949.*)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net Lloyd. 1998.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ersma, Paul and David Weenink. 2022.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Version 6.2.20). Available from <<https://www.fon.hum.uva.nl/praat/>>.
- Chan, Marjorie K.M. 1980. Zhong-shan phonology: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is of a Yue (Cantonese) dialect.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 Chan, Marjorie K.M. 2023. The zero initial in Chines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to D2 and L2 acquisition. *Buckeye East Asian Linguistics*. Volume 6, edited by Mineharu Nakayama, Marjorie K.M. Chan and Zhiguo Xie (eds.), 1-14. Columbus, OH: Knowledge Bank, OSU Libraries.
- Chang, Jung. 1986. With Jon Halliday. *Mme Sun Yat-sen*.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Ltd.
- Chao, Yuen Ren. 1947. *Cantonese prime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 Chao, Yuen Ren. 1948b. *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80. A system of "tone-letters." *Fangyan (方言)* (1980) 2:81-8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0 in *Le Maître Phonétique*, troisième série, no. 3, pages 24-27.)

Chen, Ping. 1999.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g, Siu Kei (鄭紹基). 2011. 孫中山粵語演說的語音分析：管窺 20 世紀初廣州話的實際發音 (A phonetic analysis of Sun Yat-sen's Cantonese speech: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ctual pronunciation of Cantones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ong, Douglas D.L. 2010. Hawai'i's Nam Long: Their background and identity as a Zhongshan subgroup. *Journal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0) : 13-21.

Coblin, W. South. 2002. Migration history and dialect development in the lower Yangtze watershed.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5.3:529–543.

Crowe, Michelle. 2019. Breaking sound barriers: China's earliest known sound recordings.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Libraries*. Published on 13 February 2019. <<https://libraries.indiana.edu/firstrecordings>> (Accessed on 16 July 2023)

Egerod, Søren.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south Chinese idiom*.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Ltd.

Epstein, Israel. 1993. *Woman in world history: 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ling (Mme. Sun Yatse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Hahn, Emily. 1941. *The Soong siste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1907. *Die Nanking Kuanhua*. Göttingen: Druck der Dieterich'schen Univ.-Buchdruckerei (W. Fr. Kaestner).

Jones, Daniel and Kwing Tong Woo. 1912. *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Karlgren, Bernhard. 1918. *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with an introduction essay on the pronunciation*.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13. Stockholm.

Lai, Him Mark. 2000. Retention of the Chinese heritage. I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0-31.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Li, Fang-kuei.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13.

Liao, Fangzhou. 2017. Sounds from Shanghai. *The Old Phono Blog*. Published on 22 August 2017. <<https://www.oldphono.com/blog/11-sounds-from-shanghai>> (Accessed on 16 July 2023)

Lobscheid, W. 1866.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英華字典*.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Martin, Bernard. 1944. *Strange vigour: 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London & Toronto: William Heinemann Ltd.

Mateer, Rev. C. W. 1906.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ateer, Rev. C. W. 1922.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 Kwang Hsüeh Publishing House.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lleyblank, E.G.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Pulleyblank, Edwin G. 1991.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harman, Lyon. 1965.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Hamden, CT: Archon Books.

Siegel, Jeff. 2010. Second dialect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2017. Whence came Mandarin? Qīng Guānhuà, the Běijīng dialect, and the National Language Standard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7.1:67-88.

Tam, Gina Anne. 2020. 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sui, Tsz-Him and Marjorie K.M. Chan. 2020. Lexical choices in Dr. Sun Yat-Sen's 1924 Cantonese audiorecording. Presented at the 5th Workshop on Innovations in Cantonese Linguistics (WICL-5), held virtually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8-19 April 2020.

Williams, S. Wells. 1889.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Yan, Margaret Mian. 2006.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dialectology. München: LINCOM Europa.

Yue, Anne O. 2003.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84-12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llenges in D2 and D3 Acquisition: Dr. Sun Yat-Sen's 1924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udiorecordings

Marjorie K.M. Cha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han.9@osu.edu

Abstract

Two short audiorecordings from Dr. Sun Yat-sen 孫逸仙, made in 1924, serve as the corpora for the study of his second and third Chinese dialect acquisition. His first dialect (D1) was Zhongshan (中山) Cantonese, his second dialect (D2) Standard Cantonese, and his third dialect (D3) Mandarin. Using the two audiorecordings, one of him reading Cantonese and the other Mandari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ypes of errors that Dr. Sun made in his D2 Cantonese and his D3 Mandarin speech productions, focusing on patterns of consistency or inconsist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target production, and the mapping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dialect.

Key words: Zhongshan dialect, Cantonese, Mandarin, dialect acquisition, Sun Yat-sen